

● 语言学

○ 引进与诠释

编者按:多模态话语(语篇)分析是当今西方语言学界的一个热点。本期以此为核心组稿。田海龙、张向静和李德志在多模态框架中,或者以视觉语法为基础展开研究,或者直接进行视觉语法分析。王凤以言和非言为分野,对隐喻进行多模态探索。这 3 篇文章属于结合广义语言现象实施的具体考察。而代树兰则从纯理论角度出发,梳理、反思多模态话语研究的缘起与进展。须要指出,就任何科学而言,具体语言现象分析和纯粹理论反思都是其有效发展必不可少的方面。

图像中的意义与媒体的意识形态: 多模态语篇分析视角*

田海龙 张向静

(天津商业大学,天津 300134)

摘要:本文以 Kress 和 van Leeuwen 提出的视觉语法为理论基础,对中英媒体报道奥运会圣火采集仪式时使用图像的情况进行多模态语篇分析,揭示中英媒体在这一事件的报道中体现的不同意识形态。分析表明,通过图像制造者在向量、接触、距离、视角、信息值、显著性和框架等方面的加工,图像已不再具有简单的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而是成为媒体表达其意识形态意义的一种方式。

关键词:视觉语法;多模态语篇分析;图像;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13)02-0001-6

Meanings in Images and Ideologies of Media: A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Tian Hai-long Zhang Xiang-jing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ianjin 300134, China)

Applying Kress and van Leeuwen's Visual Grammar to a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images about the Olympic torch lighting ceremon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veal the ideologies hidden in the Chinese and British media. It is found that the media agents, by means of vector, contact, distance, perspective, information value, salience, and framing, have extended the images from their representative meaning, interactional meaning and compositional meaning to a way of expressing their ideologies.

Key words: Visual Grammar;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image; ideology

2008年3月24日,北京奥运会圣火采集仪式在希腊奥林匹亚举行。正当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在采集仪式上庄严地发表讲话时,一名“记者无疆界组织”成员突然奔向讲坛,展开1个由5个手铐相连组成的图标。在场的希腊警察马上跑过去,迅速将其制服并带离现场。许多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但各自的角度和立场却有很大不同。

本文选用中国国际在线和英国BBC的两篇报道为分析语料,对报道中采用的图像及其说明文字进行多模态语篇分析,探究中英两国媒体在报道这一事件中所体现的意识形态差异。

1 图像的意义解读

多模态语篇分析是 O'Toole (1994) 同 Kress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语境的本体与认知研究”(11YJA740081)的阶段性成果。

和 van Leeuwen(1996/2006) 开创的一种新的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范式。他们对语篇的理解基本上延续了批评性语篇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对语篇的认识, 在认为语篇是“社会实践的形式, 是社会实践的符号成分”(Chouliaraki & Fairclough 1999) 的基础上, 提出语篇是“居于社会之中的关于客体的实践形式”(Kress & van Leeuwen 2001: 20) , 是社会实践活动中的所有符号成分, 包括有声的、无声的和视觉的符号。换言之, 如果说批评性语篇分析认为语篇是社会语境中的符号成分, 那么 Kress 和 van Leeuwen 更加详细地界定了这些符号成分, 将文本、图像、音乐、颜色、版式等多种模式的符号囊括在语篇的范畴之内。与此相似, 李战子(2003) 将多模态语篇(multimodal discourse) 定义为除了文本之外, 还带有图像、图表等的复合话语或者任何由一种以上的符号编码实现意义的文本。所有这些多模态语篇(也称话语) 即是多模态语篇分析的对象。

Kress 和 van Leeuwen 以韩礼德系统功能语法(Halliday 1994/2000) 为基础, 提出视觉语法这一多模态语篇分析理论。Kress 和 van Leeuwen 认为, 韩礼德提出的3大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 并非仅限于语言符号, 它同样适用于对包括图像、声音、颜色、版式等在内的社会符号的分析。Kress 和 van Leeuwen (1996/2006) 在《阅读图像》(*Reading Images*) 中比照韩礼德的功能语法, 建立了对图像的分析框架。他们认为图像可以体现3种意义: 再现意义(representational meaning) 、互动意义(interactive meaning) 和构图意义(compositional meaning) 。

图像的再现意义对应功能语法中的概念功能, 表征图像中人物、地点和事件之间的交际关系或概念关系(Kress & van Leeuwen 1996: 119) 。Kress 和 van Leeuwen 根据图像是否有向量这一特点将其区分为叙事性和概念性两大类。向量是叙事图像的标志, 而概念图像中则没有向量。在此基础上, 叙事图像又分为行动过程(action processes) 、反应过程(reactional processes) 、言语过程(speech processes) 和心理过程(mental processes) 等, 其中行动过程和反应过程又可分为及物的(transitive) 和不及物的(non-transitive) 两种类型。

图像除了可以再现图像中人与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外, 还可以构建观看者和图像中的世界之间的特定关系, 即互动意义。互动意义主要通过接触(contact) 、距离(distance) 和视角(perspec-

tive) 3方面的共同作用, 构建出观看者和再现内容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 也可以表示观看者对所再现的景物应持的态度(李战子 2003) 。就“接触”而言, 当图像中的表征参与者(represented participants) 直视观看者时, 表征对象就与观看者接触, 即使只是想象层面上的接触。这时, 图像中的表征参与者似乎在向观看者索取什么, 如表征参与者希望与观看者建立一种更加亲密的社会关系, 等等。这类图像称做“索取”类图像(Kress & van Leeuwen 1996: 123) 。如果没有这种接触, 图像中的表征参与者更像是展馆中的展览品。他们只是客观地提供给观看者一些信息, 所以 Kress 和 van Leeuwen 称这类图像为“提供”类图像。所谓“距离”, 是指可以通过表征参与者的框架大小来构建其与观看者之间的关系。例如, 图像中只能看得见表征参与者的脸和头, 这种近距离可构建出一种亲密的关系。以此类推, 如果要构建一种不很亲密的关系, 则图像中至少要显示表征参与者的头、肩或腰部以上; 而要构建一种社会关系, 就要显示整个人, 甚至周围要有空间环绕, 直至能看见4到5个人的躯干。借用影视中的术语, 特写(头和肩) 提示个人关系; 大特写(更少) 提示密切的个人关系; 中近景(腰部以上) 提示疏远的个人关系; 长镜头(展示整个人, 正好占满框架或更远) 提示社会关系。观看者和图像中的世界之间的关系还可以通过“视角”来构建。实际上, 对景物拍摄视角的选择暗示着拍摄者对图像中表征参与者的态度, 而且拍摄者也通过不同的视角影响观看者对表征参与者的态度。例如, 正面的水平角度表明观看者属于图像世界的一部分, 倾斜的水平角度则暗示观看者不属于图像世界(Kress & van Leeuwen 1996: 143) , 而背面取景则暗示更加复杂、微妙的意义。又如, 垂直角度上的仰视、平视和俯视分别体现表征参与者与观看者之间不同的权势关系。

对应于功能语法的语篇功能, Kress 和 van Leeuwen 提出了多模态语篇的构图意义, 并分析了构图意义的3原则: 信息值(information value) 、显著性(salience) 和框架(framing) 。Kress 和 van Leeuwen 认为, 图像的上下、左右、中心和边缘分别传递出不同的信息值(Kress & van Leeuwen 2006) 。在他们看来, 从左到右的放置结构造成“已知信息→新信息”的结构; 从上到下的放置结构传递的是“理想→现实”的信息结构; 从中心到边缘的放置结构传递出“重要→次要”的信息结构。所谓“显著性”, 指的是图像中的成分吸引观

看者注意力的不同程度,可通过被放置在前景或背景、相对尺寸、色调值的对比、鲜明度的不同等来实现。所谓“框架”,指的是图像中有无空间分割线条。这些线条表示图像中各成分之间在空间上被分离或被连接的关系。对某个成分的分割越是明显,越是表明这个成分表达的信息与其他成分的不相容或不相关,或者说,这些成分不属于同一个世界。

在 Kress 和 van Leeuwen 的理论中存在两类参与者:互动参与者(interactive participants)和表征参与者(represented participants)。前者指的是交际行为中的参与者,即图像的制作者和观看者;后者则指图像中再现的人物、事件或地点,换句话说,表征参与者就是观看者阅读或讨论的对象(Kress & van Leeuwen 1996: 46)。在下面对中英报道中图像意义的解读中,3 幅图像涉及的表征参与者分别为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闹事者、警察和闹事者手持的横幅。在分析媒体的意识形态时,将主要讨论中英两个媒体制造并传播这些图像的动机。

2 中英报道中图像的意义

依据 Kress 和 van Leeuwen 关于解读图像意义的视觉语法,本文先对中英两篇关于奥运会圣火采集仪式报道中配发的图像进行多模态语篇分析,解读图像所体现的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然后,在下一节探究中英两国媒体在报道这一事件中所体现的意识形态差异。图₁和图₂是中国媒体“国际在线”的报道(访问于 2008 年 03 月 27 日 11:51),图₃是英国媒体 BBC 的报道(访问于 2008 年 3 月 24 日 14:00)。



图₁ 文字说明:一名“记者无疆界组织”成员在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发表讲话时打开横幅“闹场”。



图₂ 文字说明:闹事者被希腊警察制服,并被带离现场,北京奥组委主席继续沉稳庄严地发表讲话。



A protester briefly ran behind Beijing's envoy as he spoke

图₃ 文字说明:在北京使节讲话时一个抗议者短暂地跑到他身后。

2.1 再现意义

2.1.1 中国媒体图像的再现意义

中国媒体国际在线刊登的两幅图像都有向量存在,具体来说,警察将闹事者推离现场存在远离观看者的向量,另外刘淇注视发言稿的视线构成另一个向量。按照 Kress 和 van Leeuwen 的区分,它们属于叙事图像,而且包含了两类叙事过程,警察将闹事者推离现场属于行动过程:警察是动作者(actor),闹事者是目标(goal);而刘淇注视发言稿则为反应过程:刘淇是反应者(reactor),发言稿是现象(phenomenon)。两类过程都由两个参与者构成,因此图像为及物的叙事图像。

2.1.2 英国媒体图像的再现意义

英国媒体配发的图像与中国媒体刊登的图像都存在向量,因此都属于叙事图像。然而,两个媒体所刊登的图像中包含的向量却不完全相同。具体来讲,BBC 配发的图像虽包含两个向量,但只有一个向量与中国媒体刊登的图像相同,即刘淇注视发言稿,而另一个向量则完全不同。在 BBC 配发的这幅图像中,观看者无法看到警察对闹事者的行动过程,取而代之的是由闹事者的目光构成的向量,即闹事者的目光直视观看者。这里,闹

事者是反应者,观看者则是现象。在这个叙事图像中,由于观看者并没有出现在图像中,所以这个反应过程是不及物的,只有反应者,没有观看者,或者更准确地说,观看者是想象中的。这样,BBC配发的这幅图像虽属叙事图像,并包含两个反应过程,但其中一个为及物的,另一个为不及物的,这与中国媒体刊发的图像形成区别。

2.2 互动意义

2.2.1 中国媒体图像的互动意义

第一,在“接触”的体现方面,图₁和图₂中表征参与者都没有直视观看者,也就是说,表征参与者没有与观看者建立“接触”关系,因此,这两幅图像都是“提供”类而不是“索取”类图像。

第二,在体现表征参与者与观看者的“距离”方面,在图₁和图₂中,观看者可以看见刘淇腰部以上的部分。这里刘淇与观看者的关系被拍摄者用近景镜头构建成一种个人关系。这与两幅图像对闹事者和警察的距离再现有所不同:图₁给他们的是中长镜头(整个人物),提示的是他们与观看者的关系是社会关系;图₂用长镜头拍摄他们(可看见至少4个人的躯干),提示的是他们与观看者的关系是公共关系。

第三,在拍摄视角的选择方面,图₁和图₂在水平角度上都选择了倾斜角度,暗示观看者不属于图像世界的一部分。图像中展示的是表征参与者的世界,与观看者无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图₁中对闹事者拍摄视角的选择,在这幅图像中,拍摄者选择给予闹事者背后视角,与其他两幅图像,尤其与英国媒体图像形成鲜明的对比。

2.2.2 英国媒体图像的互动意义

第一,刘淇与观看者没有“接触”;警察背对观看者,也与观看者完全没有一点接触。然而,与观看者有接触的却是闹事者。图中闹事者直视观看者,试图从观看者那里“索取”什么,具体地说,闹事者试图与观看者交流,与其建立某种亲密的关系。

第二,图像中的刘淇是用特写镜头拍摄的,观看者只能看到他的头和肩,目的是建构他与观看者的关系是个人之间的。闹事者则是用中镜头拍摄的,提示的是他与观看者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的,而不是个人之间的。警察和刘淇一样是用特写镜头拍摄的,但是他背对观看者,所以他与观看者之间的关系很淡薄。

第三,图像中各个表征参与者的拍摄视角也是各不相同的。这幅图像取景用的是水平角度,在这个角度上,刘淇是倾斜的,观看者不属于刘淇

世界的一部分,刘淇所做的事情是观看者不参与的。虽然刘淇与观看者之间是近距离,但是他与观看者不接触,这与拍摄者选择的拍摄视角意义一致。闹事者以及他手中横幅的拍摄视角是正面的,表明观看者与他属于同一个世界,他所做的事情是观看者参与的事情。这也是拍摄者选择让闹事者与观看者有“接触”的原因。而这幅图像中警察的拍摄视角是背向观看者,表明拍摄者不希望观看者与警察有丝毫的交流。

2.3 构图意义

2.3.1 中国媒体图像的构图意义

首先,中国媒体两张图像表征参与者在图像中的位置有所不同,因此,两张图像的信息值也不相同。具体来说,图₁中,刘淇位于图像左侧,警察和闹事者被置于图像右侧。根据 Kress 和 van Leeuwen 的观点,“位于左侧的成分体现的是已知信息,位于右侧的体现的是新信息”(Kress and van Leeuwen 1996: 187),所以,刘淇是这幅图片要传递的已知信息,而警察和闹事者是新信息。但是图₂则与之完全相反,刘淇位于右侧,体现新信息;警察和闹事者位于左侧体现已知信息。这两幅图像完整地再现了圣火采集仪式上发生事件的整个过程:刘淇正在讲话突然出现闹事者,警察前来制止。因此,图₁中闹事者和警察在图像右侧,为事件中的新信息。图₂中闹事者已被带离现场,刘淇仍然在庄严地发表讲话,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此刻刘淇的状态成为图像要传递的新信息。

其次,两幅图像中表征参与者的显著性特征趋于一致。这两幅图像中,相对尺寸较大的表征参与者都是刘淇,并且他被置于前景位置,而且与观看者的距离最近,所以两幅图像中最显著的表征参与者是刘淇。另外,在警察和闹事者两个成分中,警察被置于前景位置,比闹事者稍加显著,而闹事者则出现在这两幅图像中最不显著的位置。

最后,对图像中的框架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在图₂中,刘淇的后背形成一条垂直的分隔线条,将图像分为左右两部分,并且刘淇与警察和闹事者的向量方向完全相反(刘淇向左,警察和闹事者向右),因此可以说这条垂直线条将图像中的成分分割成两个世界。图₁同样也存在分割线条,这一线条是由闹事者的背包和腿部形成的,同样将他与刘淇分割成两个不同的部分,分属不同的世界。

2.3.2 英国媒体图像的构图意义

首先,分析图像中成分的摆放位置可以发现,

在图₃中,刘淇位于图像左侧体现已知信息,闹事者和警察位于图像右侧传递新信息。可见,图₃再现的时刻与中国媒体报道中的图₁大体相同,但再现的视角存在很大差异。

其次,图像中成分的显著性与中国媒体图像存在明显区别。在图₃中,相对尺寸最大的不是刘淇,而是闹事者,他几乎占满整个相框,而且他被置于图像的前景位置,成为图像中最凸显的表征参与者。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刘淇被置于图像的左下角,并且只看得见头和肩,相对于闹事者来说,显著性较弱。图像中最能吸引观看者注意力的是采用背后视角再现的警察,从摄影构图角度来讲,正是由于警察的存在观看者的注意力更容易被吸引到图像的右侧,进而注意到与警察位于同一区域的闹事者及其手持的横幅。可见,这幅图像中要凸显的部分是图像右侧的表征参与者。

最后,图₃中的框架分割线条不如中国媒体报道中的图像明显。图₃中,3个主要的表征参与者,刘淇、闹事者和警察形成一个视觉上的整体,给观看者的感觉是他们在空间上属于同一个部分,而不是事实上的属于不同的世界。

3 中英媒体的意识形态

以上通过对图像中“表征参与者”的分析解读,我们发现这两组图像在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须要指出的是,图像表达的不同意义不仅是图像本身所含有的意义,更重要的,这些意义是中英媒体对奥运会圣火采集仪式报道中所体现的不同意识形态。之所以称这些意义为意识形态,是因为这些图像的“互动参与者”(媒体)带有明显的机构特征,他们通过其掌握的主流媒体在影响和支配受众对这一事件的认识。正如 Fairclough 所指出的那样,“意识形态是对世界某个方面的再现,而这种再现对建立、保持和改变在权力、统治和剥削等方面的社会关系发挥作用”(Fairclough 2003: 9)。在这个意义上,图像作为一种语篇形式也在再现事件的同时参与社会实践和构建新的权力关系(田海龙 2009)。

下面,我们对媒体这一“互动参与者”进行分析,探究中英媒体如何通过图像的不同来再现、传递他们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态度。

首先,中英两媒体的图像对刘淇的再现方式存在明显差异。刘淇在中国媒体图像中都是以中近景镜头拍摄的,观看者可以看到刘淇手握发言稿,镇定、庄严地发表讲话。并且刘淇是图像中最

显著的表征参与者,也就是说,刘淇是最能吸引观看者注意力的成分。而在 BBC 拍摄的图像中刘淇被置于图像的左下角,观看者只能看到他的头和肩。观看者看到这幅图像后,并不能得知刘淇正在做什么,更不能得知他此刻的状态。换言之,中国媒体传递的是一个自信、庄严、没有受到任何干扰的刘淇,而英国媒体中的刘淇留给观看者更多的是恐惧和不安的感觉。在这一事件中,刘淇是中国的使节,是奥组委主席,他不仅仅代表他个人,更代表了中国整个国家的形象,中国媒体再现的是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中国都能应对自如,不会向任何闹事分子低头。而英国媒体则一如西方传统媒体对中国秉持否定态度,认为中国在举办奥运会过程中如果遇到如图所示的闹事行为或许会存在恐惧心理。

其次,两媒体图像中对警察的再现也不相同。中国媒体两幅图像中都再现了警察将闹事者推离现场这一动作过程,通过两幅再现事件不同时刻的图像,传递给观看者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刘淇发表讲话时,闹事者出现,警察前来制止,并将其带离现场,刘淇没有受到影响,仍在庄严地发表讲话。而英国媒体图像中没有出现警察制止闹事者的动作过程,图像中的两个警察,一个可能在注视闹事者,另一个被闹事者挡住,观看者不能从图像中得知警察是否对闹事者采取制止行动,甚至观看者无从得知背向观看者的人是否真是警察。而且,英国媒体在图像中凸显了闹事者及其手持的横幅,这也和中国媒体的报道形成鲜明的对照。可以看出,中国媒体图像强调的是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以及事件的处理结果,而英国媒体图像则更关注事件本身。

最后,从图像底部的文字说明来看,中英媒体各自的意识形态也凸显其中。中国媒体报道中的两幅图像的文字说明是这样的:图₁——一名“记者无疆界组织”成员在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发表讲话时打开横幅“闹场”;图₂——闹事者被希腊警察制服,并被带离现场,北京奥组委主席继续沉稳庄严地发表讲话。

英国媒体报道中的一幅图像(图₃)的文字说明写道: A protester briefly ran behind Beijing's envoy as he spoke. (在北京使节讲话时一个抗议者短暂地跑到他身后。)

可以看出,中英媒体在图像的文字说明上对表征参与者的不同称谓表明其各自持有的意识形态存在差异。例如,中国媒体涉及到刘淇时都指明“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不仅指出他的姓名而

且交待清楚了他的身份;而英国图像配以文字说明时只是用“Beijing's envoy”(北京使节)来指代刘淇。这分别与中国媒体图像凸显刘淇这一表征参与者,而英国媒体图像中不突出刘淇这一表征参与者的再现方式是一致的。这一不同的再现方式所体现的不同意识形态在对闹事者的指代方面非常明显。中国媒体图像的文字说明用“闹事者”和“一名‘记者无疆界组织’成员”来指代闹事者,“闹事者”在中国人的认知习惯中属于贬义词,用这一词语来指代图像中的“闹事者”可见媒体对他的否定态度。而英国媒体图像的文字说明用“protester”(抗议者)来指代闹事者,通过选择使用“抗议者”这个中性词(如果不是西方意识中的褒义词的话)来渲染其对这个闹事者的纵容。这种不同的态度在所摄图像中也得到了相同的体现。除此之外,中英媒体对警察的描述也不相同。中国媒体图像的文字说明强调“闹事者被希腊警察制服,并被带离现场”;而英国图像的文字说明中则只字未提警察的存在。显而易见,英国媒体不想让观看者或读者把注意力放在警察身上;而中国媒体则通过图像和文本强调警察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从而再现事件的处理结果。这里,中英媒体一个明显的意识形态区别在于:中国媒体认为闹事者的行为是违反当地法律的,应该受到制止,而英国媒体对这种违法行为则置之不理。

中英媒体通过图像和文字说明对闹事者干扰奥运会圣火采集仪式这一事件的报道,不仅反映出不同的两个媒体对这一事件的不同态度,而且他们通过各自的传播渠道影响着读者和受众对这一事件的认识。这里,图像也不再是简单的意义载体,而变成主流媒体参与社会实践的手段,成为其建立、保持或改变权力关系的语篇实践。

4 结束语

本文运用 Kress 和 van Leeuwen 提出的视觉语法分析方法对中英媒体报道奥运会圣火采集仪式时使用的图像进行分析,揭示了中英媒体对这一事件的不同报道角度:中国媒体强调事件发生

的整个过程以及事件的处理结果;而英国媒体则更加关注事件本身。这种不同的报道角度不仅体现在两媒体所选用的图像上,也同样体现在图像底部的文字说明上。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多模态语篇中文字与图像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加强、并形成一种“合力”(成文 田海龙 2006: 136),来影响受众对事件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这一案例分析可以强调,就像批评性语篇分析通过对文本的语言学分析来揭示文本中隐含的意识形态一样,多模态语篇分析通过对图像中“表征参与者”的分析来解读图像的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进而揭示“互动参与者”赋予这些图像的意识形态意义。

参考文献

- 成文 田海龙. 多模式话语的社会实践性[J]. 南京社会科学, 2006(8).
- 李战子. 多模式话语的社会符号学分析[J]. 外语研究, 2003(5).
- 田海龙. 语篇研究: 范畴、视角、方法[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
- Chouliaraki, L. & Fairclough, N. *Discourse in Late Modernity: Rethink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 Fairclough, N. *Analysing Discourse: Textual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 [M]. London: Routledge, 2003.
-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4/2000.
- Kress, G. and van Leeuwen, T.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M]. London: Routledge, 1996/2006.
- Kress, G. and van Leeuwen, T. *Multimodal Discourse: The Modes and Media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M]. London: Arnold, 2001.
- O'Toole, M. *The Language of Displayed Art* [M].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4.